

底消解了主体性的时候，似乎同样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而在面对这种数字时代的危机之时，不同的理论家也做出了反思。当尼尔·波兹曼在警告技术垄断的时候，他指出了新的技术形态对过去的文化带来的侵蚀。当许煜在谈论后现代之后的情境时，表达了他的忧虑：“机器智能正在形成巨大的系统，表面看似已经与人类融为一体，实则使人类越发远离生产的中心，从而消解了系统的人类中心主义。”^[27]而当韩炳哲在谈论数字化时代的问题时，提出了“同质化的恐怖”——同质化的恐怖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28]

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媒体是‘去身体化’的”^[29]，而上述这段描述还仅仅只是表达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对于身体知觉的去物质化表现，这还只是数字迷失带来的主体性的丧失，更不要说通过虚拟技术对身体的替换和取代了，所以他说：“在数字秩序之下，我们只是在同质化的数字空间里游移。”^[30]

“同质化的恐怖”恰好体现的是主体性消解带来的困境，当主体丧失了独立的“意识/观念”之后，当身体知觉被数字技术彻底去物质化，被虚拟空间完全迷惑和裹挟之时，这就是人彻底丧失自我陷入技术垄断深渊的时候。如何抵抗这种恐怖，如何避免这种境地，或许这就是艺术需要承担起的责任。今天的艺术需要成为那个已经在数字技术时代消失了的“他者”，成为一种在看似平凡的日常中那个异质性的“赛博格”，并且，仍然需要去寻找和重塑某种新的主体性。去物质化并不意味着堕落或高尚，虚拟也并非令人恐惧的迷雾，而是会提供新的可能和挑战，无论如何，这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特性，开放的“恶之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浸在数字化迷失中并保持沉默。

[27] 许煜：《后现代及其后？》，载黑阳主编《非物质 / 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第229页。

[28] 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4页。

[29] 同上书，第87页。

[30] 同上书，第94页。

家、空间与女性身份认同辨析——对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人类学考察

Home, Space and the Discernment of Female Identity :
A Design Anthropology Study of the Frankfurt Kitchen

赵诗嘉 李敏敏* ZHAO Shijia LI Minmin*

摘要 家庭空间是性别身份建构与认同的重要语境，设计则充当了建构的媒介。以法兰克福厨房为起点的现代厨房一方面成就了科学高效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并未真正减轻女性的劳动负担，使她们陷入更加固化的身份困境。本文在设计人类学视角下，针对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进行批判性考察，通过分析背景、空间安排、物品布置、风格等要素，探讨空间设计及“家”概念的表达对女性主体性身份建构所具有的双面性。

关键词 法兰克福厨房，设计，空间，女性身份认同，设计人类学

Abstract: Family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ntext for gend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nd design serves as a medium for construction. The modern kitchen, starting from the Frankfurt kitchen, has achieved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household chores on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not truly reduced the labor burden on women, causing them to fall into a more rigid identity dilemma.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Frankfurt kitchen designed by Margaret Schuter Riotsk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thropology. By analyzing elements such as background,

作者简介：赵诗嘉，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
通讯作者：李敏敏，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视觉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与科技的跨学科研究。

spatial arrangement, item arrangement, and style, it explores the dual nature of spatial desig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cept of “home” in constructing female subjectivity identity.

Keywords: Frankfurt Kitchen, design, space, female identity, Design Anthropology

空间与社会紧密相连，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不同的空间构成不同的状态、关系、组织，在不同背景下进行动态演变，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性意义。

“家”是家庭日常生活及其同步生成的空间所共同塑造的概念，被视作社会的最小细胞，一个最基础的生活共同体，一个理想的符号，在文化层面上，更是身份建构与认同的重要语境，而厨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语境。

文化问题是设计人类学的核心，设计需要被置于文化中看待，因为设计创造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影响着文化，或参与形塑文化。在本文中，设计人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手段，聚焦于厨房这一女性日常生活的情境，关注与其相关的制度、技能、物及活动，分析它们的社会语境和审美、文化意义，以及与身处其中的女性角色的关系。

一、家庭空间中的女性

在物质层面的“家”里，被包含在固定建筑中的空间、空间里的设备和其他附属物品都是人们自我表达、协调关系的媒介，针对家庭空间的设计、改造、使用等行为共同构筑其社会性。厨房作为“家”中劳动最为密集的场所，集中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空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整体缩影和展现社会力量的代表性空间场域。^[1]伴随厨房研究逐日增多的是对厨房背后性别政治的关注。在众多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论述中，厨房通常被定位为女性性别分工的载体，被刻意分隔且疏于设计。女性群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厨房的默认使用者，拥有“家庭主妇”的固定称号。她们在厨房里被分配的责任不仅是为全家准备食物，还要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母亲与妻子，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厨房长期被视作女性专属的“私人领域”，区别于男性的“公共领域”。劳动困境、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层级体系在厨房空间里被具体化，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要达到空间性别平等必须超越原有的设计和观念。

20世纪20年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社会面临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针对不断加剧的住房危机，建筑师和设计师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居住空间的改造，进行“大众住宅”实验。1926年，在德国“新法兰克福”住宅项目中，奥地利女建筑师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Frankfurt Kitchen）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厨房，对后世的厨房和家居环境设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代表，用以探索家庭空间布局的变革和女性群体之间的双面关系。对法兰克福厨房的分析，揭示的不仅是设计上的进化，也是女性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是女性追求空间性别平等之路的重要指标。

二、厨房空间与积极认同：现代性体验

设计作为语言具备建构性别主体性身份的作用，这种作用依托于社会形态和观念的变化，相应地也塑造出具备特定目标的空间和女性的社会角色。

1. 战后的“新女性”：时间压缩与关怀需求

从女性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节省劳动力是厨房的首要需求。省力需求背后反映的是对女性消费者心理、动线和人体数据的关怀需求。

工业革命前，大多数欧美中产阶级家庭厨房里的劳苦工作都由仆人承担。18世纪60年代后，机器诞生并被广泛投入使用，工厂的兴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造成仆人短缺，雇佣成本逐渐超出中产阶级可承受的负担范围，家务劳动落回以家庭主妇居多的女性群体身上。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区别逐渐消失，阶级更迭不再明显。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开始持续提高，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新女性”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的主流形式，很多女性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回家还要准备全家的晚餐，家务劳动的时间缩短，压力却成反比增加，这也导致了她们的双面需求：一方面是必须完成的家务，一方面是对舒适、休息的渴望，而后者在现实中往往不会明显表露，易被忽视。玛格丽特在调查过程中捕捉到了这一点，在砧板前设置了可调节高度的旋转椅（图1），让工作下班疲惫的女性坐下来洗菜备餐，增添了设计的人性化特征。

动线是人体在空间中活动的自然轨迹，玛格丽特采用参与式方法，通过近距离观察和询问普通家庭女性在厨房的物理动向，对1.9米×3.4米的原型空间进行规划，用秒表测量完成各项家务所需的时间，并绘制最大效率预测指示图表（图2），以获取在最短动线里完成更多任

[1] 周培勤：《“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评介》，《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3期，第127页。

务的方案；在具体规划中，布置在砧板右边的收集器用于直接推入菜渣，收满再抽出倒掉，缩减了收拾垃圾及来回走动的烦琐步骤；砧板上方的餐具收纳架设置在伸手平举可及的距离内，亦可充当沥水架（图3），用于摆放沥干洗完的餐具，同样缩短了动线。

除动线外，人体也是空间设计的重要支撑数据。从人体工程学角度，厨房的平台和柜子的尺寸应该符合使用者伸手接触到的标准，但纵观传统设计历史，女性群体的真实数据和需求经常被忽视，无论是经典设计还是普及于市面的日常设计大多采用的都是普通男性的人体数据，不仅不适用于女性，还会对她们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玛格丽特在设计时测量了女性人体的数据，并亲自体验女性伸手时的距离和习惯，以此为基础设置吊柜高度，女性可以轻松打开柜子（图4），不需要踮脚或踩凳子，有效减少了精力的耗费。这种设计的改变也意味着男女差异化的身体经验开始得到社会的正式关照。

2. 家务劳动与价值实现

玛格丽特的设计根植于对社会进程和家庭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住宅革命前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普通家庭的厨房仍建在通风条件极差的地下室或附属建筑物里，排水设施未经编排，电和煤气也未引入，照明工具仍然是光线昏暗的油灯，破旧的铸铁火炉兼具做饭和取暖功能。家具过于注重装饰性却不实用，四处散落堆放，脏乱逼仄的环境迫使女性在厨房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在社会观念层面，厨房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厨房中的家务因其空间的私密性，不被男性主导的社会承认价值和正统性。

家务劳动专业化和合理化观念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进入20世纪后，这个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与家庭科学管理观念共同推动欧美家居环境改善的进程。1919年，美国家庭经济学家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家居工程：家庭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Home*）中阐述“泰勒主义”（Taylorism）^[2]，提出优化厨房操作流线的设想。



图1. 法兰克福厨房模型，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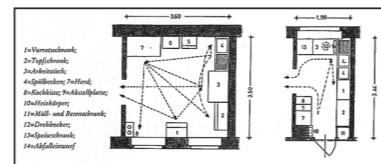


图2. 法兰克福厨房动线图



图3. 法兰克福厨房-收纳架（沥水架）

[2] 1880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发现工人在工作流程中的问题，逐渐开发出一种科学管理的方法“泰勒制”，试图通过时间和动作的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目的是找到工人完成工作的最佳方式，进而围绕这一目的设计管理系统。详见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马凤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第99—100页。



图4. 法兰克福厨房-吊柜



图5. 法兰克福厨房模型-煤气灶



图6. 法兰克福厨房-煤气灶



图7. 法兰克福厨房-可移动电灯

[3] 彭妮·斯帕克：《唯有粉红》，滕晓铂、刘翕然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第72页。

该书被翻译成德语后，推动了德国的家庭科学管理进程。女工程师莉莲·吉尔布雷思（Lillian Moller Gilbreth）也做过相关研究，提出水槽—冰箱—炉灶的“厨房黄金三角”概念。回顾法兰克福厨房诞生的现实背景，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瘟疫高发，住宅严重短缺，城市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此外，战争的影响和疾病知识的传播也促使社会现实朝社会意识转化——对卫生和清洁的追求，灰尘因被确信藏有大量细菌而被视作最大的邪恶。^[3]因此，公共卫生知识与科学管理方式的普及作为应对策略逐渐渗透进家庭生活的实践，首先便是对厨房的改造。

玛格丽特受泰勒主义的启发，确立了设计的核心准则：高效率和功能性。她将法兰克福厨房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删去所有装饰。备餐区配一整块大号砧板，留足摆放面积，且正对窗户，确保通风，满足社会对清洁、明亮的追求。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被引入，包括煤气灶、电灯、自来水，作为现代化厨房的能源基础，它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提供了操纵新机器与掌握新经验的机会。煤气灶（图5、图6）造型精简，按钮和储物隔间以黑白色将功能鲜明地突出。灶台安装3个灶眼，能同时进行3种菜肴的烹饪。电灯下方附带把手（图7），可随使用者的位置移动，灵活保证劳动时的照明环境。

保证效率和功能的另一重要体现是空间利用的技巧。工业技术的进步为这一技巧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批量生产的标准化板材和嵌入式电器进入家庭。在法兰克福厨房中，可折叠熨衣板（图8）被设计为固定在墙上，长度经过计算，使用时放下一端，尾部可搭在水槽边，用完向上收纳，不占用活动空间。头顶吊柜仿照科学实验室，柜门采用推拉式，取代易挤占空间的平开式。门板以玻璃取代实木材质，可以清晰地看到内置物品，帮助使用者做出判断，也赋予了易于清洁、科学可靠的理念暗示。吊柜右侧的收纳柜（图9）采用倾斜式中空木板，锅盖和锅具可以直立或倾斜摆放，以达到节省空间的目标。下

侧的铝制调料柜以抽拉式储物罐（图10）组成，铝制物品重量极轻，女性可以单手抽出，盒口设计成不规则形状，以特定角度倾斜，便于在没有量匙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倾倒调料。

从空间消费和使用的角度，法兰克福厨房的布局与设计建立了一个更加高效的家务空间，无论是动线、厨具的改造还是家电技术的融合，都提升了女性家务劳动的便利性，为其性别身份的建构谋取了有效的主动话语空间。20世纪30年代后，厨房空间以此为模板开始推广，越来越多的厨具和家电的设计也将女性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家务劳动专业化及其在设计上的变化，于女性而言是对自身工作价值的肯定，女性通过更高效的家务劳动重新营造“家”的氛围，迎合了社会的期待，从中获得满足感和自豪感。伴随着光滑、整齐、高效、节省空间的厨房的出现，科学、理性、极简等现代性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女性在家务过程中学习并操作着新技术，同时消费着厨房空间，也获得了几乎同等的理性体验。家庭空间为女性提供了性别身份操演的舞台，勾勒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方式图景，也描摹出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和崭新的自我形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父权社会施加的禁锢，对其身份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厨房空间与消极认同：风格与技术的规训

空间设计对主体性身份的建构具有双面性。从空间表层展现的功能来看，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固然通过提高家务效率对女性身份认同产生了一部分正向的推动，但从空间权力的角度，以法兰克福厨房为代表的现代厨房模式是由男性文化主导的社会对女性品位的边缘化和对女性身份的固化。

1. 现代主义与女性品位边缘化

法兰克福厨房的风格特征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从平整的操作台面、整齐的橱柜到无装饰的单一色彩，都传



图 8. 法兰克福厨房模型 - 熨衣板



图 9. 法兰克福厨房 - 收纳柜



图 10. 法兰克福厨房 - 铝制储物罐

承了包豪斯式的简约、理性。这样的厨房模式得以扬名并被视作经典的根本原因并非在其对女性消费者的关怀，而正是现代主义的审美立场。这种立场本身具有偏见，长久以来凌驾于家庭空间中占据主导的女性品位。

自维多利亚时期起，女性气质、女性品位与装饰一直缔结着紧密的关系。女性在家庭中扮演制造舒适环境、维护人类价值栖身所的角色，“家”被视作避难所，主妇们通过装饰和使用空间完成对家庭生活美学的阐释，室内装饰的女性气质和审美偏好是她们表达设计话语权并建立社会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这种维多利亚意识形态在工艺美术运动乃至其后一系列现代设计运动中遭到压倒性的批判，被视为拖累了社会现代化进程，是道德伦理的失范。而在战后，由于社会的不稳定以及重建价值观的需要，这种意识形态趋于回归。

原本被排除在设计流程之外的女性作为使用者和消费者介入，是对设计意义的“再生产”。在客厅、厨房、卧室等家庭空间，窗帘、桌布、家具等物品的装饰花纹、色彩的选择、摆放和使用习惯都是“再生产”的具体手段，展示女性气质和审美品位，也建构着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而现代主义所崇尚的“形式服从功能”，势必导致家庭空间的女性审美被标准化、集体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男性主导者们将理性、逻辑、功能、风格等象征男性知识和气质的高级文化模式建立在打压女性品位的基础上，抵制装饰，抑制女性个体经验及其价值的发挥，于无形中消解了女性品位构成的文化抵抗。

法兰克福厨房诞生后，厨房设计和家用电器设计走向性别化，并于20世纪中期步入高峰，特征是柔和连贯的流线感、防锈的金属、简洁的视觉印象，是现代主义审美与家庭生活美学的结合，也可看作对后者的修正：女性“品位”被男性“风格”入侵并最终与其达成折中。在此语境下，现代厨房所反映的家务劳动专业化、理性化是对女性品位及其文化空间的挤占。

玛格丽特作为一位女性设计师，以施惠于女性消费者为初衷，自身的性别立场却是模糊的，她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本质是根植于科学、效率、秩序的现代化、男性化空间模式。开放式吊柜、储藏家具和收纳盒在满足功能性的主要目标后，其次才是对女性展示空间缩减的补偿，以巩固被削弱的身份认同。这种设计现象背后也是当时社会各行各业普遍的性别困境，女性品位被进一步边缘化。

2. 符号、新型工厂与身份固化

设计是人类身体于外部世界的投射，即主体于客体的投射，呈现一定程度的符号化。在传统欧美家庭里，除了室内装饰和布置，女性建构身份的方式也包括自身身体的出场。女性身体被视作其气质的根本来源，空间和其中的物品则是身体和自我意识的延伸，经过装饰的厨房和女性身体共同组成“家”的意象，将自然的身体转化为文化的身份。由法兰克福厨房开启的空间模式去除了装饰，只留下女性身体和技术、现代主义的交融，“现代厨房中的女性”依旧延续“家”的代言符号。在此过程中，女性建构的主体性身份难免具有欺骗性，从空间获得的满足和自豪，本质是因为在结构性压迫环境中展示出了社会期待

的角色——家庭主妇，而非自我期待的真实角色。厨房的作用表面是制作食物，实际是“制造”女性为家庭服务的理想形象，以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反向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身份的“他者化”。

现代厨房对女性的符号化还体现在技术入侵带来的规训。工业革命后，技术革新借助设计手段从公共空间传播到私人空间，成为家庭主妇体验审美现代性身份的符号，这种现代性身份同样具有欺骗性。从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来看，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引入带来更标准的空间布局和厨房用具的功能化、电气化，厨房用玻璃门隔离形成独立空间，形似工厂流水线车间：空间方正，布局紧凑，明确的功能分区，物理边界对应拘束的心理边界，高效对应加剧的孤立感。原有的“家”的符号不再是避难所的象征，而是变成了“新型工厂”，“厨房里被科学管理的女性”则对应“工厂里被科学管理的工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借“个体规范化”^[4]阐述“规训权力”的概念：通过对个体的隔离及指定，使其行为受制于连续的检查 and 行为规范，同时借知识的管理改变个体。现代厨房所呈现的过程和本质与“个体规范化”极为类似，无形中将工厂劳工和监狱囚犯的符号意味隐喻在女性使用者和消费者身上，将女性固定在空间及行为模式的规范里，加深了性别区隔与异化，厨房仍旧是女性专属的“私人领域”。

工厂式厨房的争议在于，它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女性困境的本质——家务劳动造成负担的症结不是缺乏技术或风格导致的精力耗费，而是耗费行为本身的强制合理化。在战后集体诉求高于个人诉求的时代，这种合理化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在这个角度，无论是对女性身体的符号化还是科学、规范模式对家庭生活领域的渗透，核心仍是维护和巩固刻板文化范式及集体社会的稳定。设计作为这一核心的补丁，能够缓解却无法掩盖女性承受更多劳动负担的本质。正因如此，厨房空间设计的研究延续至今，在当下趋于包容且更关注个体需求的环境中具备丰富的讨论价值。

四、结语

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作为开启现代标准化厨房空间模式的标志，一方面从功能使用上提高了家务劳动的效率，通过现代性体验的满足感赋予女性一部分积极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符号化，利用现代主义和技术的规范挤占女性在“家”中的话语权，加深了对女性品位的边缘化和身份认同的固化。“家”于女性既是获得成就感的温床，也容易成为束缚。

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体现了一种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背后还隐藏了女性对于家庭空间功能和情感的双重需求，新的家用技术与设计形式的移植所带来的性别层面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设计积极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理应得到进一步思考。从设计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对厨房等家庭空间的设计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启示：其一是参与式实践在空间设计活动中的重要性，通过让女性用户参与设计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她们的需求、偏好和使用习惯，从而设计出更加符合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帮助女性完成更积极的身份构建；其二是对设计进行多元反馈，虽然设计致力于解决直接问题是女性用户最初的需求，但很多情况下，设计在满足最初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了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所包含的新需求在单向的设计流程中往往易被忽视。只有不断接收各种反馈，并挖掘反馈背后的刻板印象，才能持续更新理念，更深入地理解女性用户的情感和体验需求，将对生活方式的洞察与对造物形式的思考相结合，为加强性别平等的社会创新设计提供方向。

[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65页。